

# 精彩与无奈：陈兰彬 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

李喜所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陈兰彬作为中国首任留学生监督和第一任驻美国公使,属清政府少数较早走向世界的官员之一。其出国感受和受美国社会文化浸染后的思想文化观念变化,在晚清出洋官员中具有典型性。陈兰彬到美国后,一方面为美国发达的经济、现代化的建筑和优美的环境赞叹,精彩之情深藏于日记和其他书信、报告之中;一方面又不适应美国的生活,甚觉无聊,尤其是面对自由、民主、发达的美国比专制、独裁、落后的清廷优越的客观现实,又不敢直抒己见,只能无可奈何地去维护清廷的封建主义。加之,陈兰彬生性谨慎、胆小,惧怕出事丢官,出洋的数年中始终在精彩与无奈的两难中煎熬。这看似个人的悲剧,其实是近代中国畸形社会变迁过程中两难选择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晚清;出洋官员;陈兰彬;使美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112-05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出国潮中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说其精彩,是到国外后眼界大开,目不暇接,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丰富、环境的优美、人际的和谐、生活的舒适,见所未见;说其无奈,是离乡背井,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语言、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规范、价值审美等母体文化遇到了客体文化的挑战,产生了暂时的“文化失重”,要调适到最佳状态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其实,这是一般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会遇到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普遍问题。100 多年前,像陈兰彬一样的那些出洋的清朝官吏早就遇到过,只是他们较今天的负笈海外者更无奈而已。

—

陈兰彬(1816—1895),1872 年因留美幼童出国,被江苏巡抚丁日昌举荐为留学生监督,踏上了美

利坚的国土。这在晚清走出国门的官员中属先行者行列。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出国的官僚是斌春,时为 1866 年,随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往欧洲考察,斌春曾自负地在诗中称自己是“中土西来第一人”。第二位是志刚,1868 年随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往欧美各国访问。陈兰彬大概能排在第三。此后,李圭 1876 年被派往美国出席美国为纪念建国 100 周年在费城举办的世博会;1877 年郭嵩焘和刘锡鸿赴伦敦出任驻英正、副公使;1878 年曾纪泽出使欧洲;陆续出国的官员随着洋务运动的高涨逐渐频繁。但在洋务运动早期还较封闭的年代,清朝的官员并不像今天的官员那样对出国极感兴趣。因为出国不仅没有什么荣耀,反而弄不好会被闭关自守者围攻,甚至被戴上对朝廷不忠直至“卖国贼”的帽子。郭嵩焘的遭遇就是极典型的例子。有鉴于此,出洋的官员皆小心翼翼,选派官员出国也十分困难。陈兰彬的赴美,也是偶然促成。他虽然

收稿日期:2009-02-27

作者简介:李喜所(1946—),男,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办过洋务，但绝非出类拔萃者；外语又一窍不通，根本没有外事经验；更谈不上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的红人。1870年天津教案时，容闳作为翻译，借机通过丁日昌建议曾国藩向美国派留学生，得到批准。按理讲应该由容闳出任留美幼童的监督，但清廷对容闳这样一个留美出生的人才并不十分信任，于是由丁日昌推荐，命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为副监督。随后丁日昌向容闳解释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sup>①</sup>

可见，陈兰彬的被任命，完全是出于洋务派官员为了防止顽固派的无端攻击。后来李鸿章在谈到此事时，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其云：“盖以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sup>②</sup>而且，容闳第一次见陈兰彬时，印象也不错。其称：“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所惜者胆怯而无责任心也。即一羽之轻，陈君视之不啻泰山，不敢谓吾力足以举之。”<sup>③</sup>从这些不同的评论中不难看出，陈兰彬是传统封建文化历练出来的一位学识渊博、品行端正、举止儒雅、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让这样一位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谨小慎微的官员走向西洋世界，去办本质上和封建义理相抵触的留学生事务，其作为是有限的，其内心的郁闷和无奈是无法避免的。

当然，对于陈兰彬这样一个在刑部供职近20年而没有升迁的官员来讲，能换一个到美国的差事，也是意外的惊喜。遗憾的是，关于其1872年赴美时的文字记述如日记、游记等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从其1878年赴美国出任驻美公使时留下的简短的日记中，还是流露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赞美，所谓“精彩”的一面跃然纸上。陈兰彬6月27日乘船抵达旧金山时，首先对金门大桥大加赞叹，上岸后又做了如下的描述：

登岸见华人会馆酒店已挂中国龙旗，赁寓在满金荣茉莉街九层楼官殿酒店（亦竖中国龙旗）。是埠有洋商大酒店六间，此又六间中最华丽者。闻房屋器用值六百万圆，地毯足铺五顷，庭院设新制电气灯四盏，白光如月，芒焰远映，胜煤气灯，且工费省倍蓰，他日行用，谅必广矣。……其街道宽阔，形如棋盘，而以街市街为适中

之地，生意之大尤在东边。各街俱有长行街车，可坐十数人，略同泛湖小艇，而往来迅捷。又有机汽车，不用人力、马力，转动消息，自动行走。迤北地势稍高，清泉颇少，所饮之水俱由远山引来。<sup>④</sup>

在1878年那样特定的历史年代，如此豪华的现代酒店、亮如白昼的电灯、整洁繁华的街道、快速便捷的交通和干净方便的自来水设施等，可以令任何一个中国人惊喜。陈兰彬作为一个有头脑的官吏，思想的触动是多方面的。可惜其政治上太成熟，行动上太谨慎，行文中几乎隐去任何议论和政治色彩，无法窥见其内心的激动。不过，当他由哈特福特乘火车往华盛顿拜见美国总统时，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惬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一车牵率十车行，方木匀铺铁路平。

八十轮开如电闪，云山着眼未分明。<sup>⑤</sup>

及至华盛顿，陈兰彬又有这样的记述：

是为美国京都，地在纬北三十八度五十六分，经偏西七十七度二分。诸山环拱，树木郁葱，前临保多墨河，洛溪绕其西北，地势略斜。自西北隅至东南隅，约四迈半。议政院高踞冈上，形式特胜，建造尤极宽敞华瞻，地基圈广三十洋亩，四面衢道，或铺红瓦白石，或以油煤和土筑成，光洁如拭。隙地则数步一树，间以各色花丛，铸铁长几随在摆设，以供行人歇坐。院中大塔螺旋至顶，高三百余尺左右。分上、下议院，各可坐千余人。大门外塑华盛顿石像，仪伟壮观。正门以铜为之，雕镂工致，云值六万圆。院墙壁有油画二幅，云一值三万余圆，一值万余圆。伯里玺天德正衙，名曰“白屋”，以其皆白石建成。铁栏森整，园沼宽宏。外部、库务衙署在其东，兵部、水师衙署在其西。另有离宫在京西数里外，因山为圃，错置亭榭，任人游观。<sup>⑥</sup>

这里的记述虽然极其客观，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窥见陈兰彬对现代建筑的赞叹，因环境优美的喜悦。在通篇日记中，即使如此谨慎的陈兰彬，也时不时地会写下“万厦整洁，街道宽广”的溢美之词。在给好友的信中，则稍大胆一点，讲“外洋繁华已极，美国尤甚”<sup>⑦</sup>。如果拿那时的美国和清朝相比，无论哪方面清朝都十分落后，即使像陈兰彬这样谨言慎行的清朝忠臣，也起码会承认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这是促成其出国后感到“精彩”一面的基本原因。

但是,从能看到的相关记述中还可以发现,陈兰彬的使美并不振奋,也少快活,常常是在“无奈”中度日,在苦恼中应付工作。他不懂英语,交往中的困难甚觉苦闷,常常在给好友的信中诉苦。其云:“特于洋语洋文一无所请,除督课幼童外,欲别做一事,隔手则诸多不便,转有,不若在中国时之耳目灵通、手足便利者。窃用闾闾非知己者,不可使闻此言,知己者,又不可使不闻此言也。”<sup>⑧</sup>除了失去语言优势之外,陈兰彬对美国的政教风俗也看不惯,他认为:“诚以外邦政教远逊中华,特恃艺术精到,驯致富强。”<sup>⑨</sup>这种认知导致他对留美幼童学习和日常举止的西方化十分反感,因而常和容闳发生争论。容闳在解析陈兰彬的思想根源时称:

盖陈之为入,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sup>⑩</sup>

容闳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陈兰彬虽然身在美国,但为人处事基本上还是在国内那一套,至于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取向也不敢超出封建陈规而有所突破。这就是容闳在上面所强调的“中国人之见解”。既要让留美幼童系统接受美式教育,从小学读到大学;又不能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思想文化,超越传统封建教育的规范。这样矛盾的基本无法行得通的指导方针,由陈兰彬这位留学生监督来实施,他也虔诚地愿意实施,其心中的痛苦难以解脱,自然苦不堪言。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兰彬越来越力不从心,日夜企盼有人来接替他的职务。他在致老友的信中说:

弟生质本弱,遇事筹思,辄觉心力不足。五旬以外,往往看书不能终卷,写字每多错漏,一夜不寝,次日即疲,前在保定曾文正对挚甫言,弟万事看空,似入老境,阁下所闻也。……弟自思出洋以后,目眇耳鸣,眠食减损,与前渐异。此身亦无足计,惟夷人敬壮欺老,古今所同。得有替人,亦大局所系也。阁下意中有其人否?<sup>⑪</sup>

身体不好,工作又不顺心,陈兰彬一心想辞职,希望老友推荐新人来接替他。1875年,终于找到了新的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如愿以偿,从郁闷中解脱出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段使美经历让其身价陡增,1878年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又第二次

赴美,从而名扬中外,让历史无法忘却。

## 二

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年代,中国人走向西方的过程就是文化重新选择的过程。而文化的选择与更新,最终会积淀为思想观念的重建,也就是要经历一个重新洗脑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新文化的制约下,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思想改造,从而产生新的认知和新的思想观点。大致来看,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出国门的晚清官员中,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顺应世界潮流,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呼吁清政府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直至制度的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第二种是死不认可西方的先进,死守封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第三种是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或者只谈器物不触及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在洋务运动时期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这三种态度都有风险。第一种虽然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清朝推行封建专制的本质是不能变的,一旦触及封建主义的根本,就可能受到处罚,郭嵩焘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第二种看起来死守封建主义的传统,是封建专制的“忠臣”,但清政府要办洋务,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做有限的改革,拼命反对者难免被杀鸡给猴儿看,郭嵩焘的同事刘锡鸿反对郭时很受青睐,后攻击李鸿章办洋务时却被革职查办。第三种像陈兰彬这样,看似绝顶聪明,但难有政绩,其前程是有限的,何况中间派是无法持久的,待你不自觉地摇来摆去想加入某一派时,人家的接纳程度是会打折扣的。洋务运动是要改革的,但封建制度还是要维护的,这种“中体西用”式的十分矛盾的社会变革,让晚清出国的官员难以把握,其“无奈”的真正根源就在这里。

社会文化的差异常常是新思想的源泉,“无奈”事实上是新观念产生过程中的一种阵痛。晚清官员在欧美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中西差距的巨大,新的认识就越容易发生,内心之博弈也就越尖锐。前举的出国官员中,斌春虽然访问了欧美十几个国家,历时一年有余,但只是走马灯式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认识;志刚和斌春相像,走的国度也不少,时间也较长,但在某一个国家住下来

实地了解的机会几乎没有,除了对外国的繁华惊叹外,也不可能留下多少思想遗产;李圭仅是赴美国参加世博会,虽说眼界大开,但来不及思考什么问题,就回国了。这种出国游历的官员,大饱眼福,收获有限,是“洗脑”不足,“洗眼”有余。真正在西方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出现思想火花者,是脚踏实地在那里生活较长时间的有思想的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这些人。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就郭嵩焘加以简要的解析。

郭嵩焘顶住各种攻击与压力,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出任驻英公使,1879年1月31日被撤回,在伦敦生活了两年。他不像陈兰彬,对西方没有多大兴趣,而是千方百计去研究西方的富强之道,探求中国如何才能赶上欧美。郭嵩焘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到工厂、矿山、商店、银行、军营、学校、议会、社团、家庭等许多地方考察,和中国留学生如严复等讨论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他写下的日记《使西纪程》,由于提出了许多向西方学习的真知灼见,被守旧派群起围攻,直至毁版。梁启超在1923年评述这件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呀!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sup>⑩</sup>梁启超是过来人,对这件事有真切的体会,这里流露出的愤愤不平,寄予了对郭嵩焘的无限同情。事实上,郭嵩焘无非是讲了一些真话,代表了那一代清朝官员对中西社会文化走向的较科学的认知,就引来天大的麻烦。可见,那时清朝官员对西方是那样的无知和愚昧,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更新是多么的迫切。如果将郭嵩焘的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是:1. 中国正面临数千年的一大“变局”,必须顺应变化,向西方学习,即使是“尧舜复生”,也必须这样做;2. 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大力创办工商业,而且要学习欧美的管理制度,消除洋务企业的弊病;3. 重视新型人才培养,仿效西方创立现代教育制度;4. 重视对西方政治理论、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英美的“富强之道”;5. 英国的立国之本在议会制度。郭嵩焘在追述英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的根本原因时写道: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

义,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胜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而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sup>⑪</sup>

在19世纪70年代,能够像郭嵩焘这样看到西方共和制的先进性,实属凤毛麟角。如果按孙中山的观点,那就是先知先觉。回顾历史,先知先觉者多数是孤独和悲哀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超出了那个历史时期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孤独是正常的,不孤独成不了先行者。郭嵩焘的性格、人品、才识以及那段特殊的英国经历,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这也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是近代中国两难选择的一种反映。

中国的近代或曰现代进程,不是由母体自身蜕变来的,而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变迁。两难的问题几乎贯穿始终。例如,一方面要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向殖民主义者学习。只有“师夷”才能“制夷”。将这样极其矛盾的命题处理好是很不容易的。常常是强调了“师夷”,疏忽了“制夷”;注意了“制夷”,又淡化了“师夷”;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官员,在近代很难寻觅。而要真正将“师夷”落到实处,看到实效,就必须引进西学,剔除封建文化,扬弃传统,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这又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两难课题。与此同时,“师夷”还提出了封建政权的改造和更替的大问题。封建的专制制度不变革或不被推翻,“师夷”也不可能彻底实现。但清政府既不愿意被改造,更不甘心被推翻。可是不“师夷”,清政府又无法生存,灭亡得更快,清政府只好被迫应付,先办洋务,后搞新政,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脚。当然,这种自己损自己的做法是有尺度的。陈兰彬这些晚清官员,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很难把握这个尺度。做过了的丢官,不做的也难保乌纱帽。真是两难啊!说到底,清政府“师夷”的过程就是逐步走向灭亡的过程,就是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然而,走向共和又遇到两难。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但经济落后、民智未开、观念陈旧等客观因素又使共和宪政流产。后来,甚至连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初年那段历史反复后,也在重新思考中国的新道路了。总之,两难大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大特点,或许也是理解陈兰彬的一个切入点。

注释:

- ①③⑩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26、126、137 页。
- ②李鸿章《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致译署函》，转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204 页。
- ④⑥王杰提供：《陈兰彬日记》，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记。
- ⑤王杰提供：《陈兰彬海外诗六十首》第三十九。
- ⑦⑧⑨⑪王杰提供：《陈兰彬文集》，致李勉林函、致李勉林函、致丁乐山函、致李勉林函。
- ⑫梁启超《五十年中国文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39、43 页。
- ⑬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407 页。

## The Dilemma Involving Chen Lanbin and Other Overseas Late-Qing Officials

LI Xi-suo

(History Institut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Chen Lanbin, the first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Supervisor and the first Qing Minister accredited to the U. S. A. , is among the few Qing officials of overseas experience earlier than others and is typical among the late Qing officials sent abroad in terms of overseas perception and ideological, cultural, conceptual changes effected by American social cultural influence. Chen sings praises of America's advanced economy, modern construction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on one hand, which is seen in his diaries, letters and reports,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not well accustomed to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nd feels bored, especially when he face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superiority of American freedom, democracy and being-well-developed to the Qing's autocracy, dictatorship and being-behind-lagging, but dares not voice his opinion frankly and helplessly upholds the feudalism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eemingly personal tragedy of the prudent, timid Chen obsessed with fear of deprivation of his official position for indiscretion and torn by the dilemma between wonderfulness and helplessness reflects in fact the dilemma in the course of change in the deformed society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official sent abroad; Chen Lanbin; being accredited to the U. S. A.

[责任编辑:凌兴珍]